

【综述】

书写、场域与认同： 我国近二十年文化记忆研究综述

刘慧梅 姚源源

【摘要】记忆研究以其独特的时空属性、文化张力和社会关怀,成为21世纪国际人文社科多个领域的关注要点。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人文地理等学科对记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推动了文化记忆理论的深化与应用实践。但我国对这一理念的具体讨论、应用及反思仍然呈现出相对宽泛、离散的状态。现有研究表明,在记忆生成的意义空间中,文化记忆或作为本质性问题出现在回溯原点,或作为建构性力量作用于过程,或以具象符号凝聚于终点,关于文化记忆的研究是一个意义凝聚、生成并解构的循环阐释过程。我国文化记忆研究总体呈现出跨学科互动的研究态势,并随着新的时代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产生逐渐扩大其研究领域。未来可以在研究议题、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继续拓展,并逐步实现本土文化传统记忆理论的深化。

【关键词】文化记忆;文化书写;场域;认同;记忆载体

【作者简介】刘慧梅(<https://orcid.org/0000-0002-6565-7762>),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跨文化与区域研究所及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休闲、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研究(浙江 杭州 310058);姚源源(<https://orcid.org/0000-0003-4799-5167>),女,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记忆、文化遗产和文化话语研究(浙江 杭州 310058)。

【原文出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杭州),2018.4.185~203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8NDJC167YB);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党建与思政工作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课题(2017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带着西方学术界的记忆研究传统和对二战后的时代反思,德国学者阿斯曼创立了文化记忆这一研究理念,提供了一条以“宏观视角来审视和衡量历史走向”的途径^{[1]26}。它在中国学术界引入、传播和发展的近二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传统与现代、书写与遗忘、融合与批判都在记忆之名下暗流涌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人文地理等学科对记忆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推动了文化记忆理论的深化与应用实践,但我国对这一理念的具体讨论、应用及反思仍然呈现出相对宽泛、离散的状态。近年来,阿斯曼夫妇对文化记忆的研究不断拓展,而我国相关研究仍有

一定的滞后和局限。针对以上困境,为整体把握文化记忆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和研究态势,并为后续研究提供突破口,本文从文化记忆的理论背景出发,对我国近二十年的文化记忆研究予以概述和探讨。

首先,本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全景式的研究综述,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领域;其次,结合我国研究现状,本文对文化记忆的研究综述主要围绕记忆的表现形式、空间实践和功能作用三个方面,尽可能地展示跨学科视域下的应用图景;再次,对记忆的探寻是一种超时空的诗性对话和批判性反思,关注记忆研究“不仅是为了‘对抗遗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2]65}。

一、文化记忆学理脉络及在我国的研究概况

“在西方的学术语境里,‘记忆研究(memory studies)’这个词包含了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国家记忆(national memory)、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等术语。”^{[13]12}这些术语展现了记忆研究的问题视野和学理维度,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的理论发展,是西方记忆研究史上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研究范畴逐步拓展到社会心理学范畴,最后抵达文化研究范畴的过程^[4]。

(一)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

在《论集体记忆》中,哈布瓦赫从家庭的记忆、宗教的社会记忆、阶层的社会记忆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提出记忆不再是个体的特权,通过对个体的约束和关系网络的控制,社会逐渐构建了集体层面的记忆,从而确立了集体记忆这一理念^[5]。哈布瓦赫强调社会对记忆的建构性,集体根据各个阶段不同的社会框架完成对过去的重构,以重新阐释过去的方式达到巩固自己主体同一性的目的。集体记忆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完成了记忆研究史上社会性与生理性的重要剥离。同时代的艺术史学家阿拜·瓦尔堡在对艺术中的象征符号、图像等西方艺术图像志的考察中追寻记忆,他把复古潮流中艺术形式的重复看作文化符号的记忆功能,这些符号可以储存记忆,并能超越时空的界限获得重生。基于此,瓦尔堡提出了“‘集体图像记忆’的观点,并将之称为‘社会记忆’”^{[6]2}。针对社会记忆这一概念,康纳顿则把问题聚焦在“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并通过人类学的考察和政治的透视把答案引向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强调权力之于社会记忆的作用^[7]。虽然康纳顿并未完全实现集体与社会的概念性剥离,但“从‘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这一脉络演进,体现了从‘集合起来的记忆’变成了‘集体的记忆’的本质突破”,记忆的社会基础、可建构性与传承性在理论发展中不断清晰和强化^{[8]77}。

(二)文化记忆的理论生成

如果说哈布瓦赫贡献了记忆的社会框架和群体

概念,瓦尔堡的社会记忆提供了记忆的具体文化符号,康纳顿通过记忆传承问题的讨论使记忆的展演得到进一步凸显,那么,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则要实现的是把记忆(同时发生的过去)、文化和群体(社会)这三个维度关联起来^{[9]6-7}。同集体记忆相比,文化记忆更加强调记忆的文化功能;同社会记忆相比,文化记忆更加注重记忆形成过程中各种社会因素(如权力、政治等)的影响,而并非是群体的社会结构。“文化记忆是一个文化理论,同时也是一个记忆理论”^{[10]5},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继承了前人记忆研究中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具有广阔的理论兼容性^①。

从记忆的历时维度来看,文化记忆与那些日常性、口头性、流动性和短暂性的交往记忆不同,“文化记忆的特点则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9]6-7}。这种超越代际的记忆内核也最终指向认同的具化,即凝聚性结构作用之下交流和认同的产生。从社会的共时维度来看,文化记忆关注的是文化内部的传承和交流方式,是在“传统的形成”“对过去的指涉”以及“政治认同或想象”等作用框架之上的文化概念^{[11]15}。文化记忆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意义生成空间,其中文化记忆以认同具体性或群体关联性、重构性、成型性、组织性、约束性和观照性等功能而发挥作用^{[6]34-35}。从记忆的具体形象来看,文化记忆是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9]7}。文化记忆涵盖了社会记忆概念中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展现。与记忆直接相关的文献、文物,促进记忆的神话、仪式、纪念物,以及整理、撰写、出版等活动都可以纳入其中^[1]。

与扬·阿斯曼对古埃及、以色列和希腊文明的远古记忆探索不同,阿莱达·阿斯曼从近代和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出发进一步拓展了文化记忆理念,他把文化记忆分为功能记忆和储存记忆,展示了文化记忆在选择和调动中的具体生成机制。历史的展演方式、身体和地方(place)作为记忆媒介,以及遗忘和储存等记忆伦理性问题都被纳入研究视域^[12-13]。文化

记忆从最初的对文明内部及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发展脉络的阐释,逐步发展成将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和空间阐释融为一体。扬·阿斯曼承认这一理论的复杂性,“文化记忆是复杂的、多样的,就像迷宫一样,包含大量的纽带记忆,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差异性的群体身份”,但同时他认为,“正是在这些张力和矛盾中,文化记忆获得了活力”^[14]²⁶。

(三)我国文化记忆研究概况

基于社会政治环境的酝酿和理论引入,国内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记忆研究从2000年开始。阿斯曼夫妇众多文章在国内期刊的发表,成为早期国内学者了解文化记忆研究的重要资料^②。作为第一批介绍文化记忆的学者,黄晓晨、王霄冰、唐少杰在译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③。此后国内学者对文化记忆理论层面的剖析逐步深入:康澄、燕海鸣、陶东风、赵静蓉、金寿福、王蜜等先后探讨了集体记忆的内涵与发展演变、文化记忆与文字、文化记忆与象征、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以及文化记忆的媒介制约等重要问题^④。2015年以来,阿斯曼夫妇的专著不断被引入到国内,《文化记忆》《回忆空间》《记忆中的历史》等著作纷纷被翻译出版,文化记忆的后续研究得以更多地展现在汉语文化世界。

国内文化记忆研究的学术氛围较为浓厚:2006年“文学空间与文化记忆”、2007年“历史与文化记忆”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2009年“文学与记忆”学术研讨会、2013年“文化·记忆·历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2015年“文化记忆:时代、历史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文化研究》和《国外理论与动态》等期刊也多次设立文化记忆研究专题,刊发了大批高质量研究文献;王霄冰、申波、冯亚琳、陈新、彭刚、赵静蓉等学者关于文化记忆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标志着我国文化记忆的研究走向较为成熟的阶段^⑤。在记忆研究中,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呈现出复杂的交织局面,对现有记忆研究的综述也呈现出跨学科分布的特点,文学、社会学、文化学、人文地理等领域

都涌现出一批综述性研究成果。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文化记忆本身所蕴含的巨大文化张力,身份认同、文本、仪式、场域、功能和机制等都是应用研究的焦点所在^⑥。

本研究综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学术观照:一方面,文化记忆形成的哲学、政治和时代背景,决定了其广泛的学科视域及多元文化的可融合性,国内外对人文地理、文化遗产及文学批评等领域研究都可以在文化记忆的概念体系内找到对接点。在文化记忆研究中推动跨学科、超学科的合作和平台构建,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时代趋势,充分整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和重要思想也尤为迫切。另一方面,文化记忆的历史性与共时性维度决定了历史和社会的双向阐释路径,记忆研究因此也与民族认同、文化复兴及社会问题密不可分^[15]。如何参与到国际学界的文化记忆研究,并展现基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和哲学思维的记忆理论研究成果,成为中国学者的时代使命。结合文化记忆的学理要素和国内研究的重要成果,我们对国内近二十年的文化记忆研究进行以下三方面综述:记忆的载体、记忆的场域以及记忆的功能,以期尽可能完整地展现国内关于文化记忆的跨学科研究现状^⑦。

二、记忆载体的文化书写

文化记忆以多种形式的文化形象得以展现,文字和仪式成为其主要载体。进入具体研究,诗歌、小说、民间传说等文学作品都是记忆的文字载体;传统节日、民俗风情、婚丧嫁娶和民族歌舞等都是仪式载体的代表;影视、新闻等传播媒介也以更加生动的技术手段对记忆进行书写;文化遗产的全球性实践在不同地方进行记忆的保护和传承;新媒体多种形式的记忆手段在不断拓展文化记忆的书写界限。

(一)文学与文化记忆

在中国文论研究“本质抑或去本质、反本质”的两种基本思路论衡的过程中^[16],理论或范式的转变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反思与自省、解构与重建、认同与区分”的思考^[17]。文化记忆视角的引入对拓宽文

艺学的边界和反思元理论等重要问题同样具有重大意义,陶东风提出,文艺与记忆这个命题“既是一个理论—认识路径,也是一个阐释—论述范畴”^{[18][13]},二者产生的是一个双向阐释范畴:一方面,从文学艺术的视角去研究记忆的书写和生产;另一方面,从记忆的角度去审视文艺的功能和价值。赵静蓉提出记忆的理论范式以回应时代的范式危机,记忆范式使文学批评从现代或后现代的抽象差异中抽离,直面“理论的建构过程、历史的表述方式及传播途径,以及文学、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多重关系”^{[17][132]}。为直面后理论时代理论批评的挑战,陈俊松从文化记忆和文学书写的交织点出发,力图推进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化记忆批评理论,以期对文学参与民族文化记忆的建构和再造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19]。王建具体考察了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酝酿、产生和在本土及异文化圈内的移植过程,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具体研究对象三个层面反思了中国文论走出去的问题^[20]。

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一种承载的文本形式,“作为‘记忆表现’的文学记忆则不断尝试着记忆表现的可能与限度”^{[21][57]}。刘顺认为文学中的记忆讨论具体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忆之所忆”即具体记忆内容,“忆之如何忆”即记忆的具体展现方式,“忆之何为而忆”即记忆最终的身份认同功能,以上三个透析视角也成为文学领域内以文化记忆进行文本分析的主要方面^{[21][62]}。其中,叙事成为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作品互文性研究的关键词:赵静蓉强调记忆本质上是符号化的建构过程,通过语言和叙事,记忆在社会层面实现了重生,成为可供认知、交流和建构的文化现象,身体作为记忆载体拓宽了记忆的边界,回应了记忆的伦理性问题^[22]。冯亚琳在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张力场中穿行,注意到了记忆的建构与选择性,而文学作品的叙述则完整地展现了这种记忆的选择过程^[23]。徐岱从文化记忆的视野入手审视了小说与历史的相互作用,最终引向对文化记忆叙事审美功能的思考^[24]。叶舒宪从文本角度探索仪式研究的文化阐释意义,从仪式叙事来

回答中国礼经的文化内涵、文化认同与历史书写等问题^[25]。毕旭玲以上海“康王建城”叙事为中心,讨论了文化记忆的建构、遗忘与重构的过程,对文化记忆中功能记忆和储存记忆概念进行了立体的互动阐释^[26]。

(二) 节日、仪式与身体表述

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的传承体系中,仪式一般集中存在于文字产生之前,“庆典和仪式是无文字社会用来把文化内涵的扩张情境制度化的最典型的形式”^{[15][73]}。王霄冰则认为,仪式“不仅和文本相辅相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具备了超越和驾驭文本的巨大潜能”^{[27][241]},因此,在考察文化记忆这一抽象概念时,必须始终将文字和仪式这两大媒介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在西方节日的冲击下,我国全国性民俗节日文化遗产受到了较大影响,对传统节日形态的抢救和保护、文化修复和文化主体地位的提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28-29]。在当下经济、社会等因素的推动下,原有的传统仪式也衍生出了新的文化功能,如民俗娱乐、身体锻炼、表演观赏、文化传承等^{[30][58]},因此,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成为节庆文化记忆研究的重要问题。李双幼从时间维度和组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泉州元宵节的历史变迁:宗教和祭祀导向让位于娱乐和消费,记忆的主体由神明和乡绅让位于行政机构^[31]。李巍从朝阳社火这一特殊的民俗活动出发,将其作为一个文化记忆的表征符号,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梳理,试图探索东北地区移民社会的深层结构和文化记忆^{[31][32]}。

少数民族因“族群自身的迁徙与繁衍、口头传承的歌声与讲述、他者言语的书写以及国家政治的力量、文化的建设、社会的革新与不可避免的民族交流与融合”等多方面的综合作用^[33],其文化记忆的传承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时代特征。蒙古族敖包祭祀、湘西还傩愿和尔苏藏族还山鸡节都是少数民族表达本民族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仪式^⑨。作为民族仪式表征类型之一,民族歌舞的考察逐渐进入文化记忆的视域^⑩,如对云南腊湾老人舞的研究发

现,舞蹈的身体承载着当地彝族同胞的文化基因和生存图式^[34];郭振华进一步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细致地总结了腊湾老人舞文化记忆的载体性、媒介性、历史性、传承性、功能性和发展性特征^[5]。李菲以身体表述为切入点,认为嘉绒跳锅庄“右旋”作为一种身体表述符号具有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双重意义,图式的符号性和意义观念的内隐性共同构建了社会历史变迁中本民族的文化记忆、族群表述与认同重塑^[36]。

(三)传媒与影视

媒介记忆作为个体记忆、群体记忆之间交互作用的组成部分,以独特的方式对文化和记忆进行提取,在信息社会和数字传播时代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7]。传媒对民族文化记忆的唤起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文本”之中,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多元主体对传媒记忆的解构正在慢慢展开,也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建构提出了新的时代挑战^[38]。李红涛等试图在传播学领域进一步界定记忆的边界,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进而聚焦新闻中的历史元素、媒体记忆生产与消费的逻辑,以及新闻生产和公共记忆之间的关联,从而推动记忆问题的批判性研究^[39]。

从记忆的书写维度来看,叙事策略和符号解码是当前媒介记忆研究领域的两大关注要点。王伟平讨论了电视纪录片的文化记忆功能,纪录片中多层次的互文性蒙太奇剪辑策略本身就是文化记忆产生的重要途径,而档案、文献、口述、老照片等文本素材则在叙述的过程中得到了多维度立体呈现,这些都作为记忆的“诱饵”逐步促使观众对过去的认识走向澄明^[40]。张宝砚着重分析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认为它是在媒介商业化背景下,电视媒介通过唤起文化记忆从而实现经济和文化双赢的传播案例^[41]。在中国文化产业进入互联网+的黄金时代,纪录片《诗词中国》则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个体的生活境遇以及诗歌文化的独特意蕴为切入点,通过互文影像化和视角平民化的叙事策略,展现了传统文化记忆的独特风貌^[42]。

从记忆的阐释维度看,影像叙事也具有强大的话语生产力,许多民族文化记忆往往以形象符号通过艺术表达、审美叙事、影像阐释等方式进行呈现^[43]。黄卫星以我国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为例,整体分析了文化记忆在特殊体制化背景下的仪式生产过程。整个《东方红》展现的是近代以来至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史,它是特定时代的文化经典,背后是更“深层的话语—符号权力的运作记忆和来自个体和群体的历史感、多元话语的复调、新媒介的抵抗”,并且它还将随着不同的时空、语境、利益主导而以新的形式继续延续^{[44][94]}。影视有着其他记忆载体不可比拟的真实性、生动性和广泛性,王琳以德国文化记忆转折点电影《大屠杀》为研究对象,追溯了20世纪70年代末这部美国电影在德国产生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探索了联邦德国战后文化记忆转变的五个过程^[45]。

(四)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一种“群体性表述”和“谱系性记忆”^{[46][13]},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记忆有着极为一致的内在逻辑:文化记忆对传统的继承、社会层面的话语建构以及多种形式的具象载体,都推动着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新的书写形式参与到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过程中^[47]。程振翼认为,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对遗产进行研究并不合适,遗产与集体记忆、文化记忆之间有着更强的统一性,公共遗产作为文化记忆研究更有利于超越遗产分类中物质、非物质的二元对立^[48]。

同文化记忆一样,文化遗产也是面向未来的社会生产。徐一超认为,原有的文化记忆能够为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想象提供经验资源与表征形式,同时当下的文化想象又可以转化为此后的文化记忆,二者互相建构,形成一个动态的文化“共生环”^[49]。王霄冰等从文本表述、仪式展演和典籍记录等方面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界定标准,并把非遗提升到自我感知与重塑的高度^[50-52]。吴宗杰、胡美馨、侯松、余华、张迎春、夏翠君等人则从批判文化遗产和中国本土遗产话语研究出发,基于对

浙江富阳东坞山和衢州、山东曲阜和邹城及杭州市上城区等地的田野调查实践,利用地方志、民族志以及经典文本等多种记忆载体对地方文化进行了古今汇通的文化叙述,对于众多濒临灭绝或长久失语的地方文化记忆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3]。

三、记忆场域的空间实践

记忆具有明显的时空属性,地方承担着储存和唤起个人与集体记忆的重要责任,也承受着记忆的刻写与重构。记忆场域不仅包括现实层面可触、可感的物质空间,也包括扎根于时间、传统和语言中纯粹无形的象征空间^[54]。记忆的场域因其概念内涵的丰富性被阿莱达·阿斯曼引入到有关近代文化记忆的话语权势关系的语言哲学研究之中,城市空间中的广场、博物馆等都成为她分析文化记忆的历史选择和表征过程的重要场所。中国学者对记忆场域的关注有着更加明显的时代特征,全球化、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以空间实践的形式在记忆研究之中展开。

(一)城市记忆空间

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拓展使得城市空间面临巨大的同质化危机,众多学者开始从城市文化记忆出发,寻求地方精神和历史文化的传承^[55]。近年来城市记忆成为文化记忆场域研究的主要领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空间场域,城市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知识系统、话语逻辑等共同作用的历史产物^[56],同时也是一种自足的文化生产形式。“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主流的抑或边缘的,神圣的与世俗的”,多维度的城市空间表现形态都与文化记忆有密切的共生关系。董琦琦从社会学领域出发,探索了空间场域和文化记忆的互文性关系^[56]。周玮和朱云峰综述了近二十年国内外关于城市记忆的研究,对城市记忆的相关概念、要素、时空属性,城市记忆与建筑景观、文化遗产、地方感等的关系以及城市记忆的社会建构进行了系统展现^[57]。

文脉延续是城市记忆研究的主要目标,仲富兰呼吁以文化记忆理论为参考,从城市固有的地形地

貌、规划布局、特色建筑,乃至居民的生活习俗等方面整合资源,拯救失落的城市文化记忆,保护城市历史景观,延续城市的文脉^[58]。李正军等进一步结合文化记忆的内容、功能和载体,提出了历史街区文脉传承文化记忆的具体策略,进一步推动了文化记忆的实践落地^[59]。城市空间的多样性来自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任晓飞在近代城市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了新生的城市文化空间与大众都市生活的关系,梳理了复杂的政治、文化、社会话语共同作用于空间生产和建构的过程^②。作为国家和集体记忆生产运作的重要场域,纪念空间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60]。李彦辉等以黄埔军校旧址以及作为记忆参观者的游客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地方和地方传奇(place myth)对集体记忆的唤醒功能,并进一步深入到国家认同的形成,把西方人文地理中地方传奇概念引入记忆地理领域^[61]。

(二)乡村记忆空间

现代化进程中地方的文化记忆认同危机不仅仅体现在城市空间,同样体现在古村落和少数民族聚集区等的记忆空间研究中,保护与变迁是乡村记忆研究的关键词。仲富兰从物质形态、非物质形态和环境生态要素三方面具体提出了保护古镇文化记忆的路径,以期更好地延续古镇地域各时期、多层次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文脉^[62]。与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不同,韦秀玉通过对南岭古村落空间信仰中的文化记忆考察提出,地方志中记载的自然景观、宗教信仰、风俗艺文等都成为文化记忆空间重要的探索依据,也为深入探索传统文化空间布局打开了新思路^[63]。

物理场所的考察是记忆空间的主要入口,也是社会话语的角逐场域。李文茂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浦江郑氏宗族文化活动为具体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宗祠、祖陵、书院、碑亭、古寨等都是构成家族记忆的场所和符号要素^[64]。在城镇化进程中,民间宗族文化记忆在地方政府、地方精英、宗族成员所组成的多元利益格局和权力话语中挣扎、妥协,并最终形成当下的空间格局。杨美洁锁定了地理想象这一概

念,作为情感线索和空间表达的地理想象在历史机制与物质空间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广州骑楼这一空间文化符号的地方建构,对记忆的场域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贡献^③。

(三)展演空间

阿莱达·阿斯曼把博物馆和档案馆作为重要的历史展演空间,分析了城市空间内历史的具体展演方式^[13]。然而国内文化记忆研究学者对这一领域的探索仍然存在大片空白,极少数学者真正做到了批判性、反思性的记忆研究。朱雷从我国台湾地区民俗博物馆的藏品、展示、建筑和活动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了博物馆在文化记忆记录和传播上的具体方式及影响,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在多种文化体系中民俗文化独特的传承方式及与社会的互相作用^④。刘博把图书馆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追溯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逐步推进,提出了文字、文献、阅读、记录、储存、注疏、阐释、教育等多个研究范畴,认为展演空间具有多样性,并不局限于博物馆类的收藏^[65]。苏丽古娜从民族艺术的角度,探讨了成吉思汗陵的视觉空间与蒙古族文化记忆的关系,独创性地拓展了有形的视觉空间和无形的文化记忆的联系和互动的分析^⑤。传统乡村文化场域——古戏台同样被置于文化历史变迁、民族生态和乡村文化建设中进行了自下而上的深层次的记忆解析^[66]。

(四)空间的媒介与符号

地方作为媒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正在文化版图的消解与重构中被慢慢激活。邵培仁把地方放到全球化的视域中进行审视,研究了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意象参与地方感塑造的主要媒介,并提出“媒介地方性”概念,它同样具有地方性的特性和共性、稳定性和动态性的特质,可以整合大量媒介,发挥更大的力量^[67]。从地方记忆的文化载体出发,建筑无疑是最为具体的空间符号之一,它既能够传承历史,同时又被历史塑造,架起了理解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薛菲以深圳中心区的公园设计为例,分析了城市记忆在开放性空间、风景园林设计中的体

现^[68]。朱竑等人则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着重调查了作为特殊文化符号的地名对承载历史意蕴和城市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作用^[69]。刘华英等对威尼斯建筑进行分析,解读了其不同建筑风格与当时政治诉求的关系,认为当代城市的宗教建筑在文化层面经受了更大的冲击,文化记忆往往通过分割、融入、衍生或共生等各种方式,或隐或显地留在当代都市空间中^[70]。邓启耀则从古代广州舆图出发,寻找佛山宗教建筑的具体记忆形象,探讨了都市佛教建筑如何维持文化记忆及其当代境遇^[71]。王姗姗和傅永军创造性地把伽达默尔的空间艺术理论应用于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开发和实践之中,从哲学诠释层面探索了建构城市历史价值、传承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路径^[72]。

(五)文学中的记忆场

“城市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多样性、开放性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意义表现空间,使文学具有了无限可能性。”^[73]⁴⁸在书写中,“作家不仅是思考者、观察者,而且还是讲述者,用自己的经历编织城市的变迁,用自己独特的观察阅读城市的风景,用自己缜密的思考揭示城市的文化内涵”^[74]¹²⁰。弋舟在其小说中以独特的记忆空间与话语符号的言说方式构建了一个“兰城”,精神创伤者的叙事视角、空间化的叙事结构以及复调的叙事话语共同书写了寄身现代性语境下的城市文化记忆^[75]。储兆文以贾平凹《废都》等都市小说为对象,梳理了其中关于西京城的空间描写、人物形象与建筑空间的关系、情节与空间的关系等,探索了文学作品中城市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精神空间的结构形态^⑥。民间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想象、流动的记忆空间和脍炙人口的传播度,很大程度上使城市记忆变得更加多元,如白蛇传这一民间传说在不断演义的过程中,逐渐丰富着民众对杭州的城市想象,塑造了对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76]。

记忆以诗歌意象的形式在文字中结晶,诗歌中的空间意象最能表达记忆的凝聚性。广场、乡村、家即是当代诗歌文化记忆的三种主要图式^[77]。刘方以

宋代学者刘子翬的《汴京纪事》为对象,结合诗人在靖康之变中的时代遭遇和诗文中的文学叙事与想象,一窥古都汴京从繁华到衰败的历史,诗文的文学叙事以具体的符号、情节、线索和文化意境为载体,共同营造了汴京昔日的都市文化记忆^[78]。郭茂全从历时性、共时性和情感维度共同审视了古诗词中兰州的城市文化记忆,其地理风貌、历史沿革、文化遗迹、民情风俗等都是城市文化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诗歌中的文学想象与审美呈现反映了不同时代士人对城市的审美视角,也是一条文化记忆变迁的脉络^[79]。

四、文化记忆的多维认同

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记忆功能的强调,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可以实现时间维度的历史传承,也能实现社会维度的群体性约束。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记忆对集体和个人的认同性建构也折射在不同的社会问题之中。对历史变迁的追溯、怀旧与消费的文化反思、创伤记忆研究都呈现出当代记忆认同的交融趋势。

(一) 传承与发展

知古以鉴今,历史的记忆已经不仅局限于特定的思维范式和价值倾向,也体现着学术认知与逻辑阐释的社会记忆。朱寿桐重新审视了新文化的百年历史后犀利地指出:只有离开了历史正统记忆的逻辑化、范式化,才有可能以较大的精神穿透力和思想深度矫正历史认知的种种歧误与迷误。文化记忆不仅具有规范性功能,同时还具有重构和反思的特性,于是铺展了“时间和结构双重维度中的历史变迁图景”^{[80][78]}。连连在深刻剖析了中西方历史传统的变迁后提出了“中国语境下的文化记忆”概念^{[81][80]},它既是结合历史维度与社会结构层面透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密码,同时也为文化记忆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来自东方古国的历史和文化经验,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意义。

对历史变迁的回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记忆过程,党大恩以《史记·封禅书》为文本对象,追溯了泰

山如何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参与下被确立为圣地,同时参与到儒家思想的民族记忆建构的过程^[82]。王霄冰从中国古代国家层面传统文化的维系途径出发,提出了文化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发展命题。“文化记忆中保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必须返回到社会记忆的层面才能得到长久的传承。”^{[83][227]}文化变迁不仅是一种社会机制和政治权力的综合话语作用,同时也是文化内部自主选择的结果,姬安龙对下寨苗族文化变迁的情况进行了主体、风俗、空间和服饰等多维度分析,从文化的内外两种因素总结了变迁的原因,展示了其特殊的内部结构和文化机制^[84]。

(二) 怀旧与消费

经济裹挟着资本重新改写了当下的社会记忆话语,剧烈的社会转型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记忆的断裂^[85]。沙家强从社会学的角度展现了现代技术的催化、消费文化的操纵、个人记忆的僭越和集体记忆的消沉给当代中国带来的记忆断裂危机^[86]。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受到主观经历、客观和科学的历史知识以及文化回忆三个因素的制约^{[1][39]}。陶成涛则进一步把文化记忆分为知识维度、情感维度和社会维度三个方面,并着重指出情感维度对文化记忆重要的引导和建构作用,当下中国文学、遗产和学术界的文化乡愁分别从不同角度折射了这种情感温度的记忆图式^[87]。

在消费时代的整体记忆危机下,传统文化的逐渐消失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身份认同的焦虑。舒开智把当下名人故里之争纳入文化记忆的研究视野,因记忆本身具有主观性、建构性和选择性,这种喧闹而尴尬的争斗实质上是消费文化所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制度的角逐^[88]。个体生命的存在焦虑和身份认同也是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主要书写主题之一,白杨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台湾现代诗为主要考察对象,展现了时代焦虑和家园情怀中多重面貌的中国形象^[89]。沈宁通过对伦敦中国城海外华人的田野考察,深入探讨了在异域空间中身份认同的主要建构力量,即文化遗产,而文化记忆则是保存和延续其

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伦敦华人社群通过其主体文化自身认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凸显着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异域文化生态的互动价值”^{[90][56]},文化遗产和记忆也在自我与他者、个体与集体的社会互动中得到不断更新和传承。

(三) 创伤与愈合

针对二战的重大历史创伤,美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创伤理论,强调文化创伤建构的社会属性,认为创伤研究具有一定社会思想文化的记忆特征。因此从创伤叙事入手,“探讨文学叙事层面上文化创伤建构的社会属性,超越个体文学书写的经验现实”,成为当代文化与社会研究重构文化记忆的研究焦点^[91]。陶东风对见证文学和文化记忆理论进行了双向阐释:首先,文化创伤具有社会文化参与、建构的属性,不是作为一个自在事实存在。其次,对文化记忆来说,见证文学不仅是创伤记忆的一种书写方式,同时也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把创伤记忆进一步转化为客观化的文化记忆^[92]。

作为特殊的时代记忆,“文革”成为众多文学影视作品书写对象和回望时代创伤的焦点。邓金明对许子东的“文革”记忆研究提出了批判性反思,他提出基于个人原初经验和独立个体的记忆现象学,这一理念最终走向以个人性、情感性及非认知性为特征且具有多元性和对话性的记忆诗学^[93]。与众多暴力或荒诞的“文革”叙述不同,范小青和王安忆把目光投向了“文革”期间的日常生活,她们对个人生活经验与历史转变的关系的叙述性探究,打通了公私空间的阻隔。文化记忆、历史描述和政治想象的另类书写给读者展现了个人主体性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不断损毁与重建^[94]。遗忘也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王友琴从“文革”批斗中的嚎歌出发,发现了不同的记忆群体对同一事件的记忆差异,对被迫害者来说,遗忘是另一种沉默的记忆方式。时代不断修改创伤的表达,也使创伤记忆不断发生变化^[95]。李新亮关注到了三十多年来“文革”小说创作的变化历

程,在创作思维上,呈现出从集体记忆到个人记忆的转变;在文体风格上,是从历史悲剧到狂欢喜剧的转变;在文学题材上,呈现出从以“文革”为主题到以“文革”为背景的转变^[96]。徐贲觉察到大众传媒高度全球化对“文革”记忆的影响,“文革”记忆不仅仅以当事人经历的历史为主,传媒(影视、出版物、网络、新闻等)也更多地参与了“文革”记忆的生成,记忆的空间也随之拓展到了超国界的传媒空间之中^[97]。

五、结语

我国文化记忆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总体特点,也存在概念泛化乃至语义过载等问题,至今仍然常常以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等术语混杂出现。在整个记忆生成的意义空间中,文化记忆或作为本质性问题出现在回溯原点,或作为建构性力量作用于过程,或以具象符号凝聚于终点,关于文化记忆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意义凝聚、生成并解构的循环阐释过程。不同学科带着自身的话语体系、研究对象和理论观照,选择以记忆的载体、场域或功能为切入点参与到具体研究之中。自这一概念被引入以来,国内研究呈现均衡上升的趋势,并随着不同的时代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产生逐渐扩大其研究领域。整体来看,我国的文化记忆研究已有较为深厚的基础,未来可以在以下方面继续拓展和深化:

首先,从研究议题来看,现有议题主要集中在文化记忆的载体,而对文化记忆的机制、场域和功能研究仍然较为薄弱。文字和仪式的书写载体使文化记忆在众多记忆理论中有着鲜明的文化触角,可以进入不同的学科视域,游走于界限之间,但对于自媒体等新媒介对记忆的影响仍缺乏研究的敏锐度。关于文化记忆的功能,亟须拓展其在教育、增进个体幸福和提升社区融合等方面功能的研究。西方对记忆的真实性、伦理及政治性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在国内仍未得到较大反响。虽然对文化记忆生成过程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但大多局限于社会权力和话语的作

用力层面,个体和集体作为记忆主体的能动性和互动性值得继续探讨。其次,从研究对象来看,文化记忆研究对象已逐渐超出了最初文学作品和仪式的范畴,碑刻、古籍、书法乃至服装和国货都进入了研究视域,金石、舆图、书画等边缘性研究也可以通过文化记忆得以激活。古今时空轴线上的众多记忆符号、表征方式和话语断层都可以为文化记忆研究提供丰富的选择,在今后的文化记忆研究中如何做到物、事、意的兼顾将成为新的挑战。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国内对文化记忆的研究仍然以阐释性论述为主,少数田野调查案例也以口述为主要支撑,人文地理研究的介入使得GIS地理信息技术成为新的研究方法。在考察文化记忆的教育、增进个体幸福感和促进社区融合功能等方面也可适当采用定量方法。文化记忆理念本身也是一种阐释性的方法论体系,其凝聚性结构如何在具体的记忆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在多样的文化叙事中得到突破。

总之,文化记忆研究有着广阔的研究视野和开放的阐释空间,它在中国引入和发展的近二十年里,在记忆的载体、实践和功能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我们也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实现更大范围的跨学科互动以及基于本土文化传统的理论深化。

注释:

①文化记忆最初被定义为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他们”。此后进一步被定义为“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所特有的重新使用全部文字材料、图片和礼仪仪式……的总和。通过对他们的‘呵护’,每个社会和每个时代巩固和传达着自己的形象,它是一种集体使用的,主要(但不仅仅)涉及过去的知识,一个群体的认同性和独特性的意识就依靠这种知识”。参看[德]哈拉德·韦尔策《社会记忆(代序)》,见哈拉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②参看[德]简·奥斯曼、陶东风《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见

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0页;[德]扬·阿斯曼、王霄冰《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社会——对记忆的记录及其发展》,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72-74页;[德]扬·阿斯曼、管小其《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载《学术交流》2017年第1期,第10-15页。

③参见黄晓晨《文化记忆》,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6期,第61-62页;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41-48页;王霄冰《节日: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5-8页;唐少杰《从文化记忆到记忆文化》,载《河北学刊》2007年第2期,第41-44,46页。

④参见康澄《象征与文化记忆》,载《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第54-61,127页;燕海鸣《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3期,第10-14页;陶东风《“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载《文艺研究》2011年第6期,第13-24页;赵静蓉《文化记忆与符号叙事——从符号学的视角看记忆的真实性》,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85-90,163页;[德]阿莱达·阿斯曼、扬·阿斯曼《关于过去视域的建构》,金寿福译,载《文汇报》2015年12月11日,第W12版;王蜜《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体制约》,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第8-17页。

⑤参见王霄冰、迪木拉提·奥迈尔《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申波《文化记忆与歌乐舞韵: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云南古戏》,(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陈新、彭刚《历史与思想(第一辑):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⑥相关综述参考:李兴军《集体记忆研究文献综述》,载《上海教育科研》2009年第4期,第8-10,21页;钱力成、张翊翊《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载《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215-237,246页;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12-120页;李彦辉、朱竑《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记忆研究的进展与启示》,载《人文地理》2012年第1期,第11-15页;钱莉莉、张捷、郑春晖等《地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记忆研究综述》,载《人文地理》2015年第6期,第7-12页;黄维、梁璐、李凡《文本、冲突与展演视角下的西方记忆地理研究评述》,载《人

文地理》2016年第4期,第17-25页。

⑦在CNKI中进行“跨库检索”(截止到2017年4月14日),选取“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含特色期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在检索项“篇名”“摘要”“关键词”下,分别输入检索词“文化记忆”,匹配为“精确”。经过初步整理,得到有关“文化记忆”的文献以数量为表征的检索结果:在“篇名”检索项下共533篇,“摘要”下共2053篇,“关键词”下共1676篇。“篇名”“摘要”“关键词”检索关系设置为“并且”的条件下,检索结果共241篇。“篇名”“摘要”“关键词”检索关系设置为“或者”的条件下,检索结果共2754篇。从文献数量来看,国内关于文化记忆的研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并分别在2008年、2012年和2016年呈现较高的数值。对检索到的最大值即2754篇文献进行关键词提取并形成共现矩阵,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记忆、文化认同都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几个关键词。经过综合考量,本综述选取以“篇名”为检索条件的文献(共533篇)进行分析,并对这些文献进行筛选和整理,具体标准是:第一,文献必须对文化记忆这一概念进行案例的互动性阐释或理论性拓展,排除脱离此概念进行讨论的研究文献;第二,文献必须是针对文化记忆这一概念的讨论、分析和应用,排除基于一般语义层面讨论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领域的高被引文献,最终进入本文研究视野的文献共97篇(含硕博学位论文7篇)。

⑧参见李巍《移民社会的文化记忆——辽宁民间社火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⑨参见额尔德木图《敖包、文化记忆与游牧社会》,内蒙古师范大学2005年民俗学硕士学位论文;刘兴禄、刘鹤《民间历史文化记忆中的湘西用坪还傩愿》,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6年第3期,第144-149页;唐佳《尔苏藏族和“还山鸡节”——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阐释》,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64-67页。

⑩参见孙璐、郭民建《由原生态歌舞解读民族文化记忆——从〈云南映象〉说起》,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80-85页;任玉庆《“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的民族传统舞龙运动的文化遗产》,载《搏击(体育论坛)》2012年第4期,第93-94页;祁晓君《民歌在舞台演唱中的“文化记忆”价值体现——以“走西口”生活主题的民歌为例》,载《音乐创作》2016年第9期,第137-139页。

⑪参见吴宗杰《中西话语权势关系的语言哲学探源——话语学的文化研究视角》,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70-177页;吴宗杰、胡美馨《超越表征:

中国话语的诠释传统及其当下观照》,载《文史哲》2010年第4期,第5-13页;吴宗杰、侯松《批评话语研究的超学科与跨文化转向——以文化遗产的中国话语重构为例》,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12-16页;吴宗杰、余华《民族志与批评话语分析》,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4期,第11-16页;Zhang Yingchun & Wu Zongjie, "The Reproduction of Heritage in a Chinese Village: Whose Heritage, Whose Pa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Vol. 22, No. 3(2016), pp. 228-241;夏翠君《地方建构视角下的青田侨乡——幸村之民居景观研究》,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82-90页。

⑫任晓飞《都市生活与文化记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⑬杨美洁《基于地理想象的广州市骑楼文化记忆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⑭朱雷《台湾民俗博物馆与文化记忆的传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⑮苏丽古娜《视觉空间与文化记忆》,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艺术学院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⑯储兆文《城市空间的文化记忆与生存体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金寿福:《评述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见陈新、彭刚编:《历史与思想(第一辑):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62页。[Jin Shoufu, "Jan Assmann and His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in Chen Xin & Peng Gang(eds.), *Cultural Memory and Historicism*,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6-62.]

[2]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2006年第3期,第46-68,206页。[Wang Hansheng & Liu Yaqiu, "Social Memory and Its Construction: A Study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Intellectual Youth Generation," *Society*, No. 3(2006), pp. 46-68, 206.]

[3]李彦辉、朱兹:《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记忆研究的进展与启示》,《人文地理》2012年第1期,第11-15,28页。[Li Yanhui & Zhu Hong, "A Review and Revelation on Memory Studies of Foreign Human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No. 1 (2012), pp. 11-15, 28.]

[4][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形成和建构》,《光明日报》2016年3月26日,第11版。[Assmann J.,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Guangming Daily*, 2016-03-26, p. 11.]

[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Halbwachs M.,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by Bi Ran & Guo Jinhu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6]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Feng Yalin, *Cultural Memory and National Values in German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3.]

[7][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Connerton P., *How Societies Remember*, trans. by Naran Bilik,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8]陶宇:《时空的镜像:社会记忆的理论谱系与研究推进》,《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76-84页。[Tao Yu, "The Mirror of Time and Space: Theoretical Pedigree of Social Memory and Its Research Progress,"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5(2012), pp. 76-84.]

[9][德]简·奥斯曼、陶东风:《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见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10页。[Assmann J. & Tao Dongfeng,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ao Dongfeng(ed.), *Cultural Studies*: Vol. 11,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pp. 3-10.]

[10][德]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见陈新、彭刚编:《历史与思想(第一辑):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5页。[Assmann J.,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in Chen Xin & Peng Gang(eds.), *Cultural Memory and Historicism*,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25.]

[11][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Assmann J.,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Cultural Memory: Writing, Memory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Early Civilizations)*, trans. by Jin Shoufu & Huang Xiaoche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Assmann A.,

Erinnerungsräume: 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Memory Space: Form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Cultural Memory), trans. by Pan L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13][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Assmann A., *Geschichte im Gedächtnis: Von der individuellen Erfahrung zur öffentlichen Inszenierung(History in Memory: From Individual Experience to the Public Production)*, trans. by Yuan Siqiao,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14][德]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第18-26页。[Assmann J. & Chen Guozhan, "What Is 'Cultural Memory',"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No. 6(2016), pp. 18-26.]

[15]张德明:《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第11-16页。[Zhang Deming, "National Cultural Memory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 Hybridization,"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3(2001), pp. 11-16.]

[16]党圣元:《本质抑或去本质、反本质——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研究的两种思路论衡》,《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第26-35页。[Dang Shengyuan, "Essence or Anti-essence: Two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ince the New Century," *Literary Contention*, No. 1(2010), pp. 26-35.]

[17]赵静蓉:《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反思——以记忆、空间和文化政治范式为例》,《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第128-134, 160页。[Zhao Jingrong, "A Reflection of Paradigm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aking Memory, Space and Cultural Politics as Examples," *Academic Research*, No. 11(2013), pp. 128-134, 160.]

[18]陶东风:《“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文艺研究》2011年第6期,第13-24页。[Tao Dongfeng, "Th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Practical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Memory': A Case Study of Three Key Terms,"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No. 6(2011), pp. 13-24.]

[19]陈俊松:《文化记忆批评——走向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批评范式》,《当代外国文学》2016年第1期,第159-166页。[Chen Junsong, "Cultural Memory Criticism: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cultural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1(2016), pp. 159-166.]

[20]王建:《从文化记忆理论谈起——试析文论的传播与移植》,《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1期,第130-134页。[Wang

Jian, "Talking from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On the Dissemi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Study & Exploration*, No. 11(2012), pp. 130-134.]

[21]刘顺:《论文学中的记忆》,《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56-62页。[Liu Shun, "On the Memory in Literature," *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No. 6(2015), pp. 56-62.]

[22]赵静蓉:《文化记忆与符号叙事——从符号学的视角看记忆的真实性》,《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85-90,163页。[Zhao Jingrong, "Cultural Memory and Semiotic Narrative on the Authenticity of Memory from the Angle of Semiotics," *Jinan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5(2013), pp. 85-90, 163.]

[23]冯亚琳:《记忆的构建与选择——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张力场中的格拉斯小说》,《外国文学》2008年第1期,第84-90,128页。[Feng Yalin, "The Tension of Communica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Memory in Gras's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 No. 1(2008), pp. 84-90, 128.]

[24]徐岱:《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叙事——在小说与历史之间》,《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354-367,436-437页。[Xu Dai, "Narrative as a Cultural Memory: Between Novel and History,"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No. 2(2015), pp. 354-367, 436-437.]

[25]叶舒宪:《仪式叙事与历史书写》,《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23-28页。[Ye Shuxian, "Ritual Narration and Its History Writing," *Journal of Baise University*, No. 2(2009), pp. 23-28.]

[26]毕旭玲:《文化记忆的建构、遗忘与重构——以上海“康王建城”叙事为中心的讨论》,《上海文化》2016年第10期,第59-66,126页。[Bi Xuling, "Cultural Memory Constructed, Forgotten and Reconstructed: A Discussion Centering on 'Kang-Wang Building a Castle' Narrative," *Shanghai Culture*, No. 10(2016), pp. 59-66, 126.]

[27]王霄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237-244页。[Wang Xiaobing, "Writing, Ritual and Cultural Memory," *Jiangxi Social Sciences*, No. 2(2007), pp. 237-244.]

[28]乌丙安:《文化记忆与文化反思——抢救端午节原文化形态》,《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第77-80页。[Wu Bing'an, "Cultural Reflection: Rescuing the Original Form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Ethnology*, No. 3

(2005), pp. 77-80.]

[29]乌丙安:《关于节日民俗的文化记忆、文化修复和文化主体地位》,《节日研究》2010年第1期,第90-96页。[Wu Bing'an,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Restoration and Culture Subjectivity concerning Festival Lore," *Festival Studies*, No. 1(2010), pp. 90-96.]

[30]袁理脉、郭颂、黄咏:《仪式传承与文化记忆:贵州松桃苗族四面鼓舞文化功能的嬗变》,《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58-60页。[Yuan Limai, Guo Song & Huang Yong, "Ritu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Memory: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Function of Four Sides Drum of Miao Nationality in Guizhou Songtao," *Journal of Guiy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 1(2017), pp. 58-60.]

[31]李双幼:《传统节庆文化记忆的巩固与传承——以泉州市元宵节为例》,《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51-57页。[Li Shuangyou, "Consolid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Cultural Memory: The Case of Quanzhou Lantern Festival," *Journal of Fujia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No. 5(2015), pp. 51-57.]

[32]李巍:《移民社会的文化记忆——朝阳社火文化的象征意义阐释》,《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第166-170页。[Li Wei, "Cultural Memory in the Immigrant Society: Explanation of the Symbolism in Chaoyang Teeming Activities,"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Ethnology*, No. 1(2009), pp. 166-170.]

[33]宋颖:《景颇族的文化记忆探析——以目瑙纵歌为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年第4期,第93-105页。[Song Ying, "A Study of Cultural Memories of Jingpo Nationality: A Case Study of the Munao Dancing Festival," *Journal of Original Ecological National Culture*, No. 6(2014), pp. 93-105.]

[34]李翼飞、刘瑞峰、郭振华等:《文化记忆下的腊湾老人舞研究》,《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49-53页。[Li Yifei, Liu Ruifeng & Guo Zhenhua, et al.,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Memory of Elderly Dance at Lawan," *Journal of Harbin Sport University*, No. 4(2015), pp. 49-53.]

[35]郭振华:《文化记忆下的腊湾老人舞研究》,《体育文化导刊》2016年第4期,第57-61页。[Guo Zhenhua, "Research on Elderly Dance at Lawan under Cultural Memory," *Sports Culture Guide*, No. 4(2016), pp. 57-61.]

[36]李菲:《文化记忆与身体表述——嘉绒锅庄“右旋”模式的人类学阐释》,《民族艺术研究》2011年第1期,第75-82,87页。[Li Fei, "Cultural Memory and Physical Representatio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Right-rotation Mode in Guozhuang, Jiarong," *Ethnic Art Studies*, No. 1(2011), pp. 75-82, 87.]

[37]邵鹏:《媒介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建构和博弈》,《当代传播》2012年第4期,第26-28页。[Shao Peng, "The Construction and Game of Media Memory and Individual Memory,"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No. 4(2012), pp. 26-28.]

[38]吴瑛:《论传媒对民族文化记忆的唤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4-81页。[Wu Ying, "On How Media Restores National Cultural Memory,"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2010), pp. 74-81.]

[39]李红涛、黄顺铭:《新闻生产即记忆实践——媒体记忆领域的边界与批判性议题》,《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第36-45页。[Li Hongtao & Huang Shunming, "News Production as Memory Practice: The Boundary and Critical Issues in the Field of Media Memory," *Journalism Review*, No. 7(2015), pp. 36-45.]

[40]王伟平:《电视纪录片的文化记忆功能》,《新闻战线》2010年第6期,第74-76页。[Wang Weiping, "The Cultural Memory Function of TV Documentary," *The Press*, No. 6(2010), pp. 74-76.]

[41]张宝砚:《电视唤起文化记忆——从〈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探析电视文化传播策略》,《现代视听》2012年第8期,第31-33页。[Zhang Baoyan, "TV Evokes Cultural Memory: An Analysis of the Strategy of TV Culture Communication from A Bite of China," *Modern Audio-Video Arts*, No. 8(2012), pp. 31-33.]

[42]孟洋:《网络诗词:新媒体时代的文化记忆》,《当代传播》2015年第1期,第80-82页。[Meng Yang, "Network Poetry: Cultural Memory in the New Media Era,"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No. 1(2015), pp. 80-82.]

[43]李娟:《中国电影的文化记忆考察——以国际电影节部分获奖影片为视角》,《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第53-59页。[Li Juan, "The Investigation over the Cultural Memory in the Chinese Movies,"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No. 5(2014), pp. 53-59.]

[44]黄卫星:《文化记忆体制化的仪式生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见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3-194页。[Huang Weixing, "Institutionalized Ritual Prod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 Case of Large-scale Music and Dance Epic 'Dongfang Hong'," in Tao Dongfeng(ed.), *Cultural Studies: Vol. 11*,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pp. 183-194.]

[45]王琳:《影像催生的文化记忆转变——以影片〈大屠杀〉为例》,《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04-112页。[Wang Lin, "The Change of Cultural Memory Promoted by Film Narrative: A Cas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he Film Holocaust on the German Cultural Memory after WWII,"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Arts & Humanity)*, No. 1(2017), pp. 104-112.]

[46]彭兆荣、林雅婧:《遗产的解释》,《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3-18页。[Peng Zhaorong & Lin Yaqia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Heritage,"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No. 2(2008), pp. 13-18.]

[47]毛巧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16-121页。[Mao Qiaohu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splay, Protection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Memory,"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No. 4(2016), pp. 116-121.]

[48]程振翼:《文化遗产与记忆理论:对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39-43页。[Cheng Zhenyi, "Cultural Heritage and Memory Theory: On the Methodology of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No. 2(2014), pp. 39-43.]

[49]徐一超:《论文化记忆—文化想象的“共生环”——基于南京民歌、“新民歌”的研究》,《文化研究》2014年第3期,第308-326页。[Xu Yichao, "On the Symbiosis Circle of Cultural Memory and Cultural Imagination: A Study Based on the Folk Songs and New Folk Song in Nanjing," *Cultural Studies*, No. 3(2014), pp. 308-326.]

[50]王霄冰、林海晓:《妈祖:从民间信仰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2013年第6期,第35-43,157-158页。[Wang Xiaobing & Lin Haicong, "Mazu: The Road from Folk Worship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Heritage*, No. 6(2013), pp. 35-43, 157-158.]

[51]王霄冰:《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的衡量标准——以祭孔大典为例》,《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第8-17页。[Wang Xiaobing, "The Standard of Measur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uthenticity: A Case Study on Confucius Memorial Ceremony," *Cultural Heritage*, No. 4(2010), pp. 8-17.]

[52]王霄冰:《国家祀典类遗产的当代传承——以中日韩近代以来的祭孔实践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82-86页。[Wang Xiaobing,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of the National Heritage on Sacrificial Ceremony: The Practice of

Worshipping Confucius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since the Modern Times,"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No. 5(2012), pp. 82-86.]

[53]吴宗杰:《中西话语权势关系的语言哲学探源——话语学的文化研究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70-177页。[Wu Zhongjie, "Exploring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Doing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 China,"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2(2006), pp. 170-177.]

[54][法]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仪式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Norra P.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The Site of Memory)*, trans. by Huang Yanhong et al.,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55]庄立峰、叶海涛:《城市空间生产中的文化记忆》,《艺术百家》2016年第5期,第217-219页。[Zhuang Lifeng & Ye Haitao, "Cultural Memory of Urban Spatial Production,"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No. 5(2016), pp. 217-219.]

[56]董琦琦:《空间场域与文化记忆的互文性关系研究》,《江汉论坛》2014年第6期,第83-86页。[Dong Qiqi,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the Field of Space and the Memory of Culture," *Jiangnan Tribune*, No. 6(2014), pp. 83-86.]

[57]周玮、朱云峰:《近20年城市记忆研究综述》,《城市问题》2015年第3期,第2-10,104页。[Zhou Wei & Zhu Yunfeng, "Review on the Studies on City Memory in the Past 20 Years," *Urban Problems*, No. 3(2015), pp. 2-10, 104.]

[58]仲富兰:《让城市文化记忆告诉未来》,《学术界》2014年第5期,第40-42页。[Zhong Fulan, "Let the City Cultural Memory Tell the Future," *Academics*, No. 5(2014), pp. 40-42.]

[59]李正军、王清智:《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历史街区文脉传承探索》,《设计》2015年第17期,第76-77页。[Li Zhengjun & Wang Qingzhi, "Historic District Inherita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Theory," *Design*, No. 17(2015), pp. 76-77.]

[60]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第134-137页。[Chen Yunxi, "Memorial Space and Social Memory," *Academic Monthly*, No. 7(2012), pp. 134-137.]

[61]李彦辉、朱竑:《地方传奇、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参观者为中心的研究》,《人文地理》2013年第6期,第17-21页。[Li Yanhui & Zhu Hong, "Place Myth, Collective Mem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Huangpu Military Academy in Guangzhou," *Human Geography*,

No. 6(2013), pp. 17-21.]

[62]仲富兰:《古镇文化记忆保护路径探析》,《河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第61-65页。[Zhong Fulan, "On the Path of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Town Cultural Memory," *Henan Social Sciences*, No. 8(2013), pp. 61-65.]

[63]韦秀玉:《南岭走廊古村落的信仰空间与文化记忆——以黄姚街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37-42页。[Wei Xiuyu, "Belief Space and Cultural Memory of Ancient Villages along Nanling Corridor: A Case Study of Huangyao Street,"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6(2016), pp. 37-42.]

[64]李文茂:《城镇化进程中文化记忆的符号建构——以浦江郑氏宗族文化再造为例》,《文化学刊》2015年第7期,第65-72页。[Li Wenmao,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Symbol: The Case of Pujiang Zheng Clan Culture Reconstruction," *Culture Journal*, No. 7(2015), pp. 65-72.]

[65]刘博:《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图书馆——社会记忆与图书馆关系新论》,《图书馆建设》2016年第3期,第13-16页。[Liu Bo, "Social Memory, Cultural Memory and Library: New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Memory and Library," *Library Development*, No. 3(2016), pp. 13-16.]

[66]宋莉莉:《传统音乐文化生存价值的当代诉求——评申波新著〈文化记忆与歌舞韵律——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云南古戏台〉》,《人民音乐》2012年第12期,第82-83页。[Song Lili, "The Contemporary Appeal of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On Shenbo's New Work *Cultural Memories and Rhythmic Art: Yunnan's Traditional Stage Plays from an Eco-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People's Music*, No. 12(2012), pp. 82-83.]

[67]邵培仁:《地方的体温:媒介地理要素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记忆》,《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43-148页。[Shao Peiren, "Temperature of Plac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of Media Geographic Elements," *Journal of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5(2010), pp. 143-148.]

[68]薛菲:《城市开放空间风景园林设计与城市记忆研究——深圳中心区公园设计案例》,《中国园林》2006年第9期,第27-32页。[Xue Fei, "Landscape Design of City Open Space and Study of City Memory: A Case Study of the Design of Shenzhen Central Park,"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o. 9

(2006), pp. 27-32.]

[69]朱竑、周军、王彬:《城市演进视角下的地名文化景观——以广州市荔湾区为例》,《地理研究》2009年第3期,第829-837页。[Zhu Hong, Zhou Jun & Wang Bin,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the Old Town of Liwan, Guangzhou from the Evolvement Perspective of Toponym,"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 3(2009), pp. 829-837.]

[70]刘华英、罗玉兰:《试析建筑对威尼斯文化记忆的重构》,《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53-156页。[Liu Huaying & Luo Yulan, "Analysis on the Architectur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Venetian Cultural Memory," *Journal of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1(2010), pp. 153-156.]

[71]邓启耀:《被“隐于市”的丛林——城市佛教建筑的文化记忆和当代境遇》,《城市建筑》2015年第34期,第43-46页。[Deng Qiyao, "The Jungle 'Hidden in The City': Cultural Memory and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 of Urban Buddhist Architecture," *Urbanism and Architecture*, No. 34(2015), pp. 43-46.]

[72]王姗姗、傅永军:《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当代价值构建——济南历史建筑的哲学诠释学解读》,《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第131-137页。[Wang Shanshan & Fu Yongjun, "The Generation of Urb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 and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Value: Interpreting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in Jinan with a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Folklore Studies*, No. 1(2017), pp. 131-137.]

[73]蒋述卓、王斌、张康庄等:《城市的想象与呈现:城市文学的文化审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Jiang Shuzhuo, Wang Bin & Zhang Kangzhuang, *Imagin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City: A Cultural Survey of Urban Literatu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74]焦雨虹:《消费文化与都市表达:当代都市小说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年。[Jiao Yuhong, *Consumption Culture and Urban Expressio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Urban Literature*, Shanghai: Academia Press, 2010.]

[75]郭茂全、张宏伟:《弋舟小说的城市文化记忆》,《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39-44页。[Guo Maoquan & Zhang Hongwei, "On the Urban Culture in Ge Zhou's Novels," *Journal of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 No. 1(2015), pp. 39-44.]

[76]王源、孙正国:《白蛇传的城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6-9页。[Wang Yuan & Sun Zhengguo, "On the Urban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of Madam White Snake," *Journal of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5(2014), pp. 6-9.]

[77]鄢冬:《当代诗歌文化记忆的三种图式》,《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93-100页。[Yan Dong, "Three Schemas of Cultural Memory in Contemporary Poetry," *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6(2014), pp. 93-100.]

[78]刘方:《东京梦华的文化记忆与文学想像——作为都市文学叙事的刘子翬〈汴京纪事〉》,《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90-95页。[Liu Fang, "Cultural Memory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the East Capital: On Liu Zihui's *Bianjing Jishi* as an Urban Literary Narration," *Journal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No. 2(2013), pp. 90-95.]

[79]郭茂全:《古体诗词中的兰州城市文化记忆》,《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23-26页。[Guo Maoquan, "The Cultural Memory of Lanzhou City in Classical Poems," *Journal of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No. 2(2014), pp. 23-26.]

[80]朱寿桐:《中国新文化百年历史以及历史的文化记忆》,《文艺争鸣》2015年第9期,第6-13页。[Zhu Shoutong, "A Century of Chinese New Culture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Memory," *Literary Contention*, No. 9(2015), pp. 6-13.]

[81]连连:《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第177-181页。[Lian Lian, "Cultural Memory in Historic Changes,"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No. 4(2012), pp. 177-181.]

[82]党大恩:《儒生、封禅和泰山文化记忆的形塑》,《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5-17页。[Dang Da'en, "Confucian Scholars, Worship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Image Building of Mount Tai Cultural Memory," *Journal of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No. 3(2003), pp. 15-17.]

[83]王霄冰:《文化记忆与文化遗产》,《励耘学刊(文学卷)》2008年第1期,第227-236页。[Wang Xiaobing, "Cultural Memory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cademic Journal of Liyun (Literature Volume)*, No. 1(2008), pp. 227-236.]

[84]姬安龙:《山地民族文化记忆——下寨苗族文化变迁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第69-74页。[Ji Anlong, "Cultural Memory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Mountain Areas: A Study on Changes of Xiazhai Miao Culture," *Guizhou Ethnic Studies*, No. 1(2012), pp. 69-74.]

[85]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Sun Liping, *Disruption: Chinese Society since 1990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3.]

[86]沙家强:《记忆“断裂”的社会学分析》,见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2-226页。[Sha Jiaqiang,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Memory 'Disruption'," in Tao Dongfeng(ed.), *Cultural Studies: Vol. 11*,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pp. 212-226.]

[87]陶成涛:《文化乡愁:文化记忆的情感维度》,《中州学刊》2015年第7期,第157-162页。[Tao Chengtao, "Cultural Nostalgia: Emotional Dimensions of Cultural Memory,"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o. 7(2015), pp. 157-162.]

[88]舒开智:《文化记忆视野中的名人故里之争》,《南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7-40页。[Shu Kaizhi, "The Debate about the Hometown of Famous Persons from Cultural Memory," *Journal of 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 2(2015), pp. 37-40.]

[89]白杨:《政治创伤中的“文化记忆”——台湾现代诗人笔下“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59-65页。[Bai Yang, "'Cultural Memory' in Political Trauma: A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China' in Taiwan Modern Poems,"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3(2011), pp. 59-65.]

[90]沈宁:《伦敦华人社群的身份认同——从文化遗产与文化记忆的角度分析》,《民族学刊》2014年第3期,第47-58页。[Shen Ning, "Chinese Identity in London: An Analysis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Memory," *Journal of Ethnology*, No. 3(2014), pp. 47-58.]

[91]段吉方:《创伤与记忆——文化记忆的历史表征与美学再现》,《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第20-24页。[Duan Jifang, "Trauma and Memory: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and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Henan Social*

Sciences, No. 9(2015), pp. 20-24.]

[92]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第10-15页。[Tao Dongfeng, "Cultural Trauma and Witness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No. 5(2011), pp. 10-15.]

[93]邓金明:《“文革”小说:集体记忆与集体书写的反思》,见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9-182页。[Deng Jinming, "'Cultural Revolution' Novels: Reflections on Collective Memory and Collective Writing," in Tao Dongfeng(ed.), *Cultural Studies: Vol. 11*,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1, pp. 169-182.]

[94]肖慧:《记忆·成长·乡土:〈赤脚医生万泉和〉的另类书写》,见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3-149页。[Xiao Hui, "Memory, Growth, Local: The Alternative Writing of *The Barefoot Doctor Wan Quanhe*," in Tao Dongfeng(ed.), *Cultural Studies: Vol. 11*,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1, pp. 133-149.]

[95]王友琴:《对“文革”的“选择性记忆”——以“嚎歌”为例》,见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0-156页。[Wang Youqin, "'Selective Memor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Howling Song'," in Tao Dongfeng(ed.), *Cultural Studies: Vol. 11*,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1, pp. 150-156.]

[96]李新亮:《“文革”小说中“文革”记忆的转变》,《当代文坛》2011年第4期,第44-47页。[Li Xinliang, "The Memory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ultural Revolution' Novel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No. 4(2011), pp. 44-47.]

[97]徐贲:《全球传媒时代的文革记忆:解读三种文革记忆》,2005年9月23日, <http://www.aisixiang.com/data/8850.html>, 2017年8月25日。[Xu Ben, "The Memor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lobal Media Era: Interpretation of Three Kinds Cultural Revolution Memory," 2005-09-23, <http://www.aisixiang.com/data/8850.html>, 2017-08-25.]